

女性经济学家何以严重短缺 兼谈那些璀璨夺目的女性经济学家

■ 徐延辉

编者按:

经济学曾因其诞生历史较长及其学科体系相对完整而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后”。但是,在号称“皇后”的经济学大家庭当中,我们却很难发现女性经济学家的身影。

那么,经济学界女性参与程度现状如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这种状况对经济学研究又将产生哪些影响?本报推送下面这篇文章,拟从经济社会学入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附上中外著名女性经济学家的故事,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和收获。

经济学界女性参与程度的现状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队伍当中,女性经济学家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对于这样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相当困难,因为很少有人关注这类话题。缺少整个行业的精确数据虽然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通过个别国家和个别经济学院的个案分析,我们仍然可以把握经济学界的主要动态。从总体上看,女性对经济学研究的参与程度非常低,其参与程度与研究层次成反比,即研究层次越高,女性研究者的数量就越少。

英国新剑桥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是世界级经济学家当中的唯一女性,而且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应该获得而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琼·罗宾逊夫人虽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一最高荣誉,但她被世人公认的最高成就就是在J·R·沙克尔顿和C·洛克斯利合编的《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一书中榜上有名。琼·罗宾逊夫人未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后来者又如何呢?

在世界各国经济学类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当中,女性研究者的数量与男性相比,在每一个研究层次上都呈现出相对短缺的状态,研究的层次越高,女性的相对比例就越

低。比如,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系当中,女性约占全日制教授的6%,助理教授(相当于英国的高级讲师)的28%。在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当中,尚有部分女性比较活跃,但在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当中,女性导师绝对是凤毛麟角。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数量很少,这在英国、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普遍现象。

女性经济学家严重短缺的社会原因

实际上,不仅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整个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当中,女性都是参与率低、“渗漏率”高,即女性以较高比例退出科学研究领域。例如,从参与率来看,1973年,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女性仅占8.7%;1996年,该比例上升到22%。从渗漏率来看,有许多最初选择了自然科学的女性,在美国之后却未从事该专业的科学,比如,1991年,美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当中,女生占33%,而在整个科学和工程专业的从业人员当中,女性仅占20%,也就是说有13%的女性退出了科学研究领域。(注:雷曼等,2001。)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社会学角度,从自然、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和收入等几个方面,提出4个假说来解释经济学界女性参与率低的原因。

第一,“自然说”。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在思维训练上需要严谨、抽象和规范。而女性思维的特点则是感性、具体和浪漫。女性思维特征使其对于语言、舞蹈及时装设计之类凭借形象思维就能够出色完成的职业情有独钟,而对于抽象的理性分析缺乏热情。以在经济学领域做得最出色的琼·罗宾逊夫人为例。尽管她的思想新颖别致、富于感染力,但她的文章一般只被认为是英语散文的杰出典范,因为她的分析方式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惯用的理论框架。(注:沙克尔顿等,1999。)因此,许多人认为女性“天生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

第二,“标签说”。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尽管女权运动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妇女解放在中国也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社会各界对女性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普遍存在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女性和社会长期互动的结果,是对女性“能做什么”或“适合做什么”问题的女性判断以及男性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上述“自然说”成立,那么女性就会有意识地规避理论研究工作而选择应用性的工作。女性“自发地”选择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社会对女性“不适合做经济学家”的经验性判断,提高了社会对女性经济学家不信任的程

度。这种状态反过来又减少了社会对女性经济学家的需求。而没有成功的女性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社会激励,女性就会出现加盟经济学界的女性更少,结果必然就是社会学理论当中著名的标签理论效应:一旦给女性贴上“你不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标签,绝大多数女性最终都不会成为经济学家。因为一旦有了这种心理暗示,多数女性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个人从业志趣,最终也就离经济学家的轨道越来越远。

第三,“人力资本说”。从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规范的前期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而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全部攻读下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硕士和博士学位攻读阶段,一般学生的年龄都在23—29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正是女性恋爱、结婚和生育孩子的黄金时间,拖延这三步曲中的任何一步都会为女性日后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攻读学位与婚恋三步曲同步进行,又非一般女性力所能及,因为已有研究证明,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当中,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也比其丈夫在养育孩子方面所花费的时间更多。社会分工或社会责任限制了女性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女性职责”约束是遵守社会规范的女性在同男性进行事业竞争时所面临的先天不足。这种约束不为经济学界所独有,在学术界和决策界正是这种约束的每一次层次这种约束都存在。正是这种约束极大地限制了女性同男性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第四,“经济说”。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属于投资长、见效慢、投资回报率不确定的高风险行为。根据博弈论,人类对风险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风险爱好、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绝大多数女性都属于后者。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多数女性都会根据最大最小原则,选择那些预期效用相对较小,但收益相对稳定的职业。因此,与现有的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应用性较强的工作相对而言更受女性青睐。当然,经济问题或收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多数国家的理论工作者都同中国的同行一样,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也有少数国家,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收入很高,美国的教授和助理教授分别比英国的教授和高级讲师多挣1/3薪水。有人认为收入太低是英国经济学研究行业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当年亚当·斯密的收入无疑很高,但收入高低绝不是他长达数十年探索“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因。此外,即使在经济学理论研究行业收入水平居于全球领先的美国,其女性经济学家的比例同收入

较低的其他国家情况相比,也并没有明显差异。由此看来,经济收入不是决定性因素,“经济说”的解释能力并不比“自然说”和“标签说”等的解释能力更强。

女性经济学家短缺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无论上述哪一种或哪几种因素发挥作用,目前的经济学界很少能够听到女性的声音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女性经济学家严重短缺对经济学理论研究具有哪些影响呢?概括起来,共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理性”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传统假设,尽管不同学派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不论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理性”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如果用女性的眼光观察人类行为,那么很多女性都会认为是,多数人类行为都是出于本能,“本能”才是人类行为的前提条件。那么,什么是本能呢?乔治·列文斯坦认为,“本能”是指一种范围很广的否定性情感(比如愤怒、恐惧、强迫状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以及感觉状态(比如疼痛)等等,这些感受都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并刺激人们去从事某种特殊行动。

本能就像传统理论中的偏好一样,能够促使人们在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行动之间作出选择。比如,饥饿就能增加一个人对食物的偏好。那么,本能和偏好有何区别呢?阿马蒂亚·森认为,偏好的本质特征是其连续性和短期内的稳定性,而本能则相反,因为欲望本身要受人们身体内部状态变化以及外部刺激的影响,所以,它能够迅速地改变人们的欲望从而改变人们的行动。

虽然“本能”或“激情”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毁灭性力量,但正是这种力量蕴涵了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使我们可以社会大背景下观察和了解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各种行为。单凭理性或功利主义恐怕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理性假设拉大了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这是偏狭地使用男性眼光观察世界的结果之一。

第二,分析方法视角单一。个人主义是经济学界传统的分析方法,也是其唯一的分析方法。一些著名的定理或命题都是以孤立的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决策行为开始进行推论并扩展到全社会的。比如,经济学家在推论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时,偏好使用埃·沃森盒式图作为分析工具,来论证社会资源如何才能实现有效配置。而埃·沃森盒式图就是假设一个社会只有两个成员(两个生产者和两个消费者),只生产两种商品或只进行两种消费品

的交换。个人主义方法论以及使用这种方法论所建立的经济学模型是经济分析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但它本身也包括了許多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福利在个人之间能否比较的问题,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假设,个人是其自身福利的最佳判断者,也即只有个人才能了解自己是否幸福。由于每个人都不了解其他人的福利状况,所以福利在个人之间是无法比较的。而实际上,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同别人进行比较。

另一对矛盾看起来更令人费解:1978年,赫伯特·A·西蒙因“有限理性”假设及其在组织内部决策中的应用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7年后即1995年,罗伯特·卢卡斯因“理性预期”及其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分析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禁让人思索这样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哲学问题:人类对知识的掌握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人类掌握的知识到底应该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有限理性”与“无限理性”究竟哪一种理性才是分析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对知识的态度就像对福利的态度一样,“相对知识论”和“相对福利论”也许更具说服力,而“相对论”正是女性思维的主要特征。

如果说男性思维像一个“点”,那么女性思维则更像一个“面”。男性视野中的世界总是单打独斗,所以孤岛上的鲁宾逊成为永恒的前提假设。而女性视野中的世界总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个人组成的群体,而且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女性看来,人是社会网络中的“点”,每一个点都被“嵌入”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

社会网络的形式、性质以及网络的密度,共同决定了网络中每个“点”的位置以及每个“点”的移动方式。因此,不论是可以用数量指标衡量的物质福利,还是难以精确计量但却普遍存在的精神福利,对于女性而言,福利总是相对的,能够用来进行福利比较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因而知识也总是不完善的。如果说男性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绝对主义,女性的方法论则是群体主义、相对主义。相对而言,似乎后者更容易接近现实世界。

结束语

由男性统治的经济学界充满了理性、模型和伺机而动的扩张。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热衷于扩建经济学帝国,但却没有人停下脚步对经济学自身的理论研究做一下盘点。也许在经济学界听到女性的声音尚需时日,但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因为罗素先生说过,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源泉,经济学研究也不应该例外。

细数中外顶尖女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界,女性群体也绝不可忽视,尽管群体不大,但她们的声音举足轻重,她们对经济学界的贡献有目共睹,她们用骄人的成绩、卓越的研究成果撑起了了经济学界的半边天。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外顶尖的女经济学家代表,排名不分先后。

国外顶尖女经济学家

Elinor Ostrom(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从国际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今只有一位女性,就是2009年度诺奖得主——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文名为欧玲,1933年出生于美国,2012年6月12日,因胰腺癌去世,享年78岁。她是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中心之一、政治学教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美国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颁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济治理活动的研究”。她于1965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1966年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做助教,1974年评为教授,1980—1984年任系主任。从1973年开始,她同时担任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讨会合作主任;1984年起又兼任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教授。同时还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制度

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她于199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1年又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她是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前任主席,也曾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她还是美国哲学学会和政治学和生命科学协会的成员。她曾经服务于许多顾问委员会,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警察长官国际协会、法律实施协助管理局、美国行政科学院、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国家顾问委员会、国家州长协会和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方法联合会。她曾任或现任众多杂志的编委,包括《美国政治学评论》、《美国政治学杂志》、《理论政治学杂志》、《制度经济学杂志》、《社会科学季刊》等。

Olivia S. Mitchell(奥利维娅·米切尔)
Mitchell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名教授,也是退休金研究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她的研究集中于公共与私人退休金、保险领域,以及风险管理、金融素养普及和公共财政。超过180篇论文。在她最常被引用到的,和 Annamaria Lusardi 共同完成的论文中, Mitchell 强调如何应对金融素养缺失问题正在成为政府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有效改善和预防金融素养缺失问题是有一定代价的,但投资其中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我们的工作恰恰证明了,普及金融素养不仅有助于巩固脆弱的社会经济环境,还有益于广大民众。”

Ellen R. McGrattan(艾伦·麦格格兰特)
McGrattan 目前供职于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院,她同时还是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的顾问。她曾经就职于明尼苏达联储的研究部门,在那儿她是排名第三的发表者。

2015年3月,McGrattan发表了一篇颇引人注目的论文,该文以支持 Thomas Piketty

提出的全球财富税(wealth taxes)的资料作为依据(注:全球财富税由 Piketty 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通过调查相关数据,McGrattan 总结到,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财富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不了解衡量财富的方式将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正如她在文中写的那样:

“不幸的是,目前有关于此的理论尚不完善。缺少有关征收财富税的定量有效理论或是经验研究的话,经济学家就没办法准确预测这种税收对总量财富和存量财富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任何有关征收财富税的提议都显得草率。”

Serena Ng(赛琳娜·吴)
Ng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她的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她3月份和 Kyle Jurado 以及 Sydney Ludvigson 共同发表的论文中,她指出,市场不确定性波动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周期远没有过去认为的那么普遍。事实上,他们发现自二战以来仅仅只有三个较大的宏观不确定时期。它们分别是:“1973—1974年和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以及2007—2009年间爆发的经济危机。需要指出的是,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是自1960年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市场不确定性波动周期。”

Claudia Goldin(克劳迪娅·戈尔丁)
Goldin 是哈佛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Henry Lee Professor),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下属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她的研究领域涵盖奴隶制、战争的经济影响、女性劳动力、移民、新交易政策、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以及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在她去年颇受好评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就职演说中,她总结道:

“性别平等不是女赢男输的零和博弈,虽然那些不赞同的人可能会因低价而惨遭淘

汰,大门多数工人都将从一个更为灵活的政策中获益。”

Bronwyn Hughes Hall(布朗温·霍尔)

Hall 不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她还是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教授。Hall 的工作集中在技术变革和创新的经济学以及计量经济学研究。鉴于经济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着系列低生产率率的挑战,Hall 有关创新的工作变得十分有意义。就像她在2013年发表的有关创新与生产率的论文中写到的那样:“在许多普通人,尤其是在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眼里,创新对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发展不仅可以增加投入更多生产要素来实现(例如增加投资、土地使用量,减少失业人数,增加劳动力等),还可以依靠以相同的资源得到更多产出来实现。”

Bertrand 现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校级杰出教授(Chris P. Dyalynas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她还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以及劳动研究所(IZA)的研究成员。

Bertrand 的研究领域是应用微观经济学,她主要关注劳动经济学、合作财政和发展经济学。在她2013年与 Adair Morse 合作完成的论文《Trickle-Down Consumption》中,Bertrand 强调了美国家庭储蓄率下降会导致地区间出现收入不平等。在剔除有关储蓄率下降的传统解释(例如预先储蓄和财富效应)后,他们总结到:

“在对这些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模式进行更加详尽的行为分析后,我们发现人们进行额外消费的可能性与市场内不断增长的‘奢侈’品供应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人们过度消费也可能是为了通过‘可视’的消费行为来赶上自己富裕邻居的消费步伐。”

(下转 A3 版)

深切缅怀 著名经济学家 周叔莲先生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周报》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所原所长周叔莲,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3月5日13:20在河北燕达医院逝世,享年89岁。本报对他的仙逝表示沉痛的哀悼!

周叔莲,1929年生,江苏溧阳人,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第三任所长。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马洪任工经所所长,周叔莲是副所长之一。后来,马洪担任社科院院长,蒋一苇任所长,周叔莲继续担任副所长。1985年,周叔莲升任所长。

在中国经济学界,他较早从理论上论证了国有企业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自负盈亏。他最早提出了中国应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发展战略,对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卓越建议。

1977年,周叔莲在《光明日报》发表《科学·技术·生产力》,在全国首先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产生巨大影响,曾获198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周叔莲先生治学严谨,理论研究紧密联系实际,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作为本报顾问,先生对本报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不辱年高,亲自为本报撰写理论文章,令人为之感动。今大师逝,但其严谨、执着的学术精神永存。本期特编发两篇文章,以缅怀周叔莲先生。

《经济学家周报》编辑部
(相关链接见 A4 版)